

关于托克维尔悖论的历史解读

史傅德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治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托克维尔悖论。18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完善和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之间出现巨大的张力。传统政治体系无力创造出一种政治话语来吸纳第三等级中新兴社会阶层,这不仅无法赋予中央政府改革的合法性,也给新社会阶层带来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政治语言与实际操作的背离大大削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结果平等自由的新思想大行其道。本文指出尽管在政体研究上托克维尔极富洞见,但是他对于新生的社会阶层如无产阶级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所以会出现他强调自由,却担忧平等的现象。

关键词 托克维尔悖论 意识形态 合法性 政治语言 公民社会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5.01.009

托克维尔醉心于悖论,似乎能从悖论推理中获得某种智力上的愉悦。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参考《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将“托克维尔悖论”解读为符合普遍结论的一种独特性观察。书中常被论及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革命之所以发生,往往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每况愈下。那些忍受高压强权毫无怨言、甚至毫不自知的人民,往往在压迫稍有放松之时奋起反抗,挣脱枷锁。历史的经验证明,毁于革命的政权几乎总是优于其前任政权,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封建制度正是在其行将灭亡之时激起了法国人心中最为强烈的仇恨。”

书中更这样概括道:

“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无法忍受其现状。人们对于这一奇特现象感到惊讶,但历

史上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①

这样一个问题摆于我们面前:托克维尔所提到的这一现象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他对这一现象的概括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又是基于何种前提?他为何认为这一现象是一个悖论?换言之,他在得出这一“历史规律”之时,怀有哪些隐含的预设?

托克维尔的兴趣在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而他得出这一悖论显然是因为他在观察大革命之前已有这样一种假定:糟糕的时局导致社会关系紧张进而引发革命;反之,改革能够改善社会状况,缓和社会矛盾,进而也就避免了革命的爆发。然而,法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尽管政府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革命却爆发了。如此,法国有关大革命起因的疑问就需要进一步扩展开来:法国当时是改革过火还是改革乏力?是改革过速还是改革欠缺?另外,改革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管控,更好的宣传?政府,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公共舆论能不能更好地推广改革,以便防患于未然?再者,大革

命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尤其是对政治实践提供切实的指导?这又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托克维尔研究18世纪的法国有何深意呢?

托克维尔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但他显然知晓基佐在19世纪20年代所作的关于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的讲座。^②托克维尔的贵族出身以及个人观念都让他与这位学术导师有很多共通的观点。《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既非一部政治学或社会科学的论文,也非仅仅是在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相对短暂而平凡的游历中的体察^③。这是一篇伟大而杰出的论文,或许应该叫做“推理政治学”更为合适,其中逻辑推理取代了更大篇幅的历史学实证研究,而这一逻辑推理又受到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等人所作《联邦党人文集》的影响,作者谈及的“自然”趋势往往来自清晰的逻辑推演而非具体的研究。

不过,这种推演所体现的智慧要比简单的事实陈列更加引人入胜。在托克维尔看来,当代社会将趋向于个体平等,亦即所称之的“民主”。这一平等首先是一种事实上的平等,因而也是一种潜在的、萌芽的政治民主。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托克维尔在回到欧陆之后,不仅在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甚至在法国旧制度中也发现了这种“天然的”民主,而这三个政权也都分别为革命所更迭——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托克维尔目睹并亲历了1848年二月革命,他曾担任国民议会副议长,参与起草了新宪法,还曾任法国外交部长拥护1848年6月的血腥镇压。他支持卡芬雅克将军而不是鼓吹民粹主义的小拿破仑,正是后者在1851年发动的政变给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他不仅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事件,同时也积极地参与其中。他情感丰富,在他的《回忆录》中亦是如此^④。但他还是需要了解史实究竟如何,而他显然并未做到这一点。托克维尔手头有很多故事经历,但头脑里却没有一部清晰的历史。因此,他一头扎进旧制度时期的档案里,回到一个世纪之前,去寻找典型的先例,探究历史的相似性,追问政治的动机和治理的逻辑^⑤。

二

托克维尔身为一名法律专家和政治家,对官

僚体系的运作了如指掌,并依照自己的政治经验对档案资料进行了筛选。他追溯法国法律政令的修订及执行状况,上及御前会议(*conseil royal*),下至基层总督,并将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他还细致深入地研究了当时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比较了当时人对税负的不同意见。除了比较研究欧陆各国当时的改革状况,他还将法国的社会阶层状况同欧陆其他国家做了对比。托克维尔沿着上述线索进行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时社会整体上存在进步,与之相伴的是政治治理上的进步,但对此他并未予以详细阐述。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他都未讨论金融、银行业和工业以及政治经济。但他以专业的角度探讨了各种赋税,凡尔赛宫如何根据预算制定了这些税收政策;他还探讨了基层城镇尤其是乡村的财政压力、税收减免和政府优惠政策。对于当时的法国,他还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人人都搞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贵族阶层已失去其特权地位,不再如之前一样独享军事、政治乃至经济上的权力与影响力;与此同时,第三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进行地产、金融投资,继而通过金钱交易加官进爵、扶摇直上,担任行政要职,自成一体,成为社会新贵;此外,法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个游离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传统贵族和新贵阶层都过从甚密,影响着舆论的走向;佃农阶层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尽管各地情况有异。贵族阶层既不能站在王室一边去反对人民,也不能站在人民一边去反对王室。社会各阶层发生割裂,在国家中央政权面前,事实上都是相互孤立的个体,并不与传统的自身政治归属发生联系。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在经济、科技和艺术各方面的总体进步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机构改革,当时社会总体的经济状况乃至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经济状况都要比他们自我感觉并表述的状况要好,当然大多数佃农是个例外。然而,恰恰是在行政改革最为成功地扫除了旧障碍、为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铺平道路的时候,革命获得了生存的土壤,并以最为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托克维尔欣然承认旧制度仍有许多领域需要改革,但这些改革都已然发生,而且甚至要比其他国家的改革更为有效、更为显著。所以,他认为革命犹如脱缰之野马横冲直闯并非由改革事业未竟

而导致,至于中央政权已经实现的改革,那就更与革命的发生毫无关联。换言之,他认为革命诉求背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原因,这些诉求只能被视作某种病态,某种具有传染性的心理疾病^⑥。但他还是指出了当时行政管理所存在的至少两个弱点,这两点都位于基层行政体系。一方面,地方省长虽然能够顺利执行上级的指令,但在面对一些无行政规律可循的混乱局面时只能即兴发挥。另一方面,由上层政治决策自身造成的,例如撇开已有机构突然增设新部门。这些机构单独运作可能一帆风顺,但如果放在一起则几乎无法协同合作,或者摩擦频生,造成损失。

看看托克维尔是如何筛选和组织历史档案的,这十分有趣。他自然是按照自己最为擅长的路数来进行这项工作:政治体制。他调阅了1750年前后到1787年大革命之前的相关政治档案,如是评论道:“旧有的行政体制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剧烈变化,法国进入了一个短暂而平淡的时期。这一时期犹如一道分割线,之前是旧制度的行政体制,之后是执政府统治时期创立的、现在仍在使用的那套行政体制。”^⑦由此看来,他对革命本身显然并无兴趣,而是把视角集中在中央政治体制上,关注这一体制是如何不断壮大的。对于之前的旧制度,他也不去详细探究社会的“总体趋势”和“总体进步”如何,除非这个社会是一个政治性的社会,否则他就对之不报研究兴趣。同样,他之所以关注大革命本身,只是因为革命严重阻碍了良好的政治治理下所应有的社会进步。

托克维尔指出,民主乃社会发展潮流,不可避免。但一如其前辈和后继者,他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能够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政治机构来预防民主暴政,还原“民主”社会的人性特质。他认为,在欧洲要想做到这一点,只能诉诸原先贵族体制的一些资源。这样一来,就要创设减抗衡民主社会弊端的社会机制,这在我们看来颇具讽刺意味,但考虑到托克维尔本人一直以来都惧怕并有意忽略民主社会的效应,有这个想法也很自然。他认为革命是过火行为,旧的社会状态更为理性,但他也果断承认旧制度存在问题,只是他穷尽档案和文献也未能明说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旧制度理应如何运转,他有着自己的设想,但他在文献资料中读到的旧制度却总是矛盾重重、摩擦不断。总之,他不

明就里,只有政治体制看起来很合理,符合王朝和整个国家的利益。

在托克维尔看来,以政治沟通是否充分这个标准来看,旧制度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但自1614年以来的两百年中,这一理想的状态不复存在。政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于,它能够自行通过各个政治集团的层层审议汇总,最终向国王呈报一个涵盖国家真实状况方方面面的综合报告,国王继而应当在国家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监督之下审时度势,通过立法或者颁布政令而有所作为。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法国人只能在地方三级会议当中寻到这套政治代议、政治沟通制度的踪影,这与德意志帝国的永久议会很不相同。其间,法国数次尝试开设委员会或者专家顾问会议来代替之前的三级会议,但都未能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政治代议体制^⑧。如此一来,法国社会已不再遵循传统的三级会议制度的治理方式来处理时政,而政府和政治体制却依然用旧有的传统来对待社会,企图以此来抗衡那些瓦解传统三级议会制度的社会变革。换言之,政治社会本应与公民社会相一致,这在旧时的法国确实如此。但之后的法国社会显然不再遵循旧时的政治话语,只有政治体制还沿用这套过时的政治话语来阐述国情,甚至还用以推行现代化变革。托克维尔认为,如此一来会产生混乱,进而形成悖论,发展成为冲突、反抗、叛乱和革命,可他的探讨就此戛然而止。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法国公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对此并不知晓。

三

这里我们就要提到另一位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柯尚(Augustin Cochin)。此人并非革命者,亦非共和派,而是一位天主教徒兼保皇党。柯尚他最初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大革命,他所关注的内容并不是政治宣言或政治纲领,而是社会力量的自行组织。

虽然托克维尔已经提及了知识分子群体、舆论、各种农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⑨,但他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比较而言,柯尚的研究强调社会角度,坚持认为在旧制度和大革命时期,甚至直到第二、第三共和国时期,尽管法国有很多政治活动家发表了各种政治宣言,但法国社会团体

结社以及民主总体发展都乃社会自然趋势,与个人意愿和意识无关,这为政治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⑩。这些社会团体并非反对传统秩序的革命性团体,但是确实给传统制度带来了改变。它们尝试解决法国政治语境中的悖论:用社会精英的调和一致来代替原有的政治话语。这些精英把握社会决策权,为市民社会的改革寻找方案。他们并不要求改变旧有政治话语的特点,只是一致同意将其抛在脑后,转而吸纳社会各个等级、阶层中的精英分子组成一个新的贵族阶层^⑪。他们达成了一项共识:法国社会确已陷于积弊,但改革定能将其医治,只不过必须是新形式的改革才行,^⑫即不同于路易十六正在推行的改革。

至此,距离托克维尔 50 年之后,柯尚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者着手开展一项宏大的研究计划,决定对托克维尔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个特殊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在旧制度的格局里为何会爆发这样一场革命?若把革命爆发的理由和其预设的目标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比较,会发现革命的爆发完全出乎意料,而且革命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越其初衷。托克维尔将之比作病毒感染,其源头无处可寻。另有人如古斯塔夫·勒庞则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群体性心理失常^⑬,但这些都仅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性研究罢了。

柯尚反对革命阴谋论的论调^⑭:他指出,每当政权发现,用它的那套逻辑体系——政治治理逻辑,无法合理地解释政治机制之外发生的某个事件时——哪怕这起事件并未与政权作对,它都会将其怀疑为一个阴谋,一个诡计,认为一定有人在国家和社会的传统政治体制掌控之外密谋叛乱政变,夺取国家的政治军事管理大权。为了达到目的,这些阴谋家不仅败坏社会道德,宣扬渎神和放荡的生活方式,还进行技术破坏。总之,只要与政权预计有所偏差,那必是背后隐藏着阴谋,企图叛离甚至破坏政权。另外,无论何时、何事,只要不是政府策划和组织的,而且其结果不明,就会被怀疑成反政府、反当权者的阴谋、叛乱或革命。因此,政府可以顺理成章地对社会进行控制、监察,禁毁书籍,任意决定向公众公布什么而又隐瞒什么。^⑮在当权者看来,所有非政府行为都是反政府行为,非常可疑。然而,在组成社会组织、形成社

会舆论、哲学、制造知识分子阴谋以及造成社会风气腐化方面,不乏当权集团中的一些成员,甚至是精英分子参与其中,他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甚至为其提供关键支持。如此这般加剧了局势的混乱,社会政治版图上的定位都已错乱不清,一切都显得混乱、暧昧、自相矛盾,无法做出任何清晰的区分和明确的关联。

在如何看待大革命方面,柯尚与巴吕埃尔(Augustin Barruel)神父的阴谋论观点截然不同^⑯,后者认为革命是由一系列秘密团体阴谋组织发动的。的确,柯尚是一名保守的天主教徒、保皇党人,他明确反对法国大革命,甚至不赞成整个现当代社会的价值,但他借助迪尔凯姆式的社会学分析,发现并阐明了关于大革命的这样一个结论:大革命并非某些人的阴谋,而是与社会训练和社会化发展有关,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这一特定社会体系会自行组织、自我衍生,并影响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权力。柯尚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方法理解托克维尔的著作。他指出,当时法国政府和政治体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要归因于社会经济和人文科学的总体大幅提升,也包括经济、工业科技、学术研究方面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所取得的这些新发展却并未为人所知,成为了人们认识的一个盲点,托克维尔能够认识并准确地描述它,但却未能理解和分析。就在这时,我们有了柯尚的方法^⑰。这样一来,重点就落在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上。

四

对托克维尔的研究显然存在误解。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一个不断壮大的趋势,首先是社会平等,继而不可避免地发展为政治平等。平等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因为舆论的统一很可能导致民主的暴政,催生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压制公民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体又会回归到熟悉的小社会团体(*petit sociétés*)之中。这些小社会团体建立在私人关系之上,处于公共利益之外。就比如托克维尔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看到的地方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治组织,他对此颇为认可,认为它们能够调节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防止失衡^⑱。但问题在于,他将法国旧制度下、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以及英国社会当中基于个

人关系和相互依赖而形成的社会团体与新兴民主国家美国的中间社会团体做比,认为二者既然都是基于公私关系而建立的社会团体,必然也应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然而,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间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美国的情况一目了然。自18世纪美国建国初期的宪政辩论之日起,围绕名门显族和宗教派别而结成的社会团体就已成为美国社会公民自治的基本模式,成为对抗中央集权的天然力量。但在法国,市场社会外加金融体系正在瓦解私人关系构筑的社会网络,而绝对王权则通过中央政府的权力牢牢把控着金融系统。若论法国社会的个人小团体,当时共有两大类:一类是不满市场和中央政权瓦解封建社会关系体系的现状,企图重建封建社会关系;另一类则是基于市场关系的社会成员的自由结社,这是对于产生个体化的大众这一粗鄙社会的本能反应。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扮演着社会精英和先锋派的角色,却仍旧披着老派贵族的外衣。但这仅仅是借用老派贵族的形式而进行的一场杜撰,以便描述,正如马克思所说,是表演者特意挑选的“古装”。

托克维尔实际上怀疑新时代的人民大众是否真如所述那般,因为缺乏恰当的社会组织,难以定义,更难以统治和管理。如果具体情况具体看待,这些人可能身为人父,是某个家庭的成员;可能身处某个等级体系,为某位长官领导工作;可能从事某个行业,或加入某个宗教团体,或服务于某个小机关或是社会团体。他们应该是特点鲜明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一个仅用无名的数字来总称的大众。鉴于托克维尔的个人背景和家庭出身,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能理解并分析前一种个性鲜明、有所归属的人,但对于后一种仅有数量概念的大众,他就束手无策,甚至无法描述其特点,这要等到后人发明了社会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之后才能有所改观。但这后一种意义的大众确实存在,只是托克维尔对其并无积极评价。^①他所受的教育让其对这种“社会关系空白”表达了内心的恐惧,而这片空白只能由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填补。在他的晚年时代,是马克思开始着手填补这项空白。

这样一种向社会经济学转变的思想轨迹并不是头一次,之前黑格尔就已创造出的一套新的社会

建制来修缮本显粗陋的市民社会,但给这些新创造冠以旧名称。比如,黑格尔所用“Korporationen”一词,与中世纪时期的社团(corporation)一词只是名称上相同罢了,而“Allgemeiner Stand”也绝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等级”(Estate)。^②有趣的是,托克维尔与马克思在观点立场上看起来背道而驰,实则并无大差,而且互为补充。托克维尔为改良派——包括法国国王本人说话,而马克思则完全支持市民社会。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社会并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无论是法国旧制度时期还是拿破仑时期,概莫能外。

托克维尔是站在政治体制的角度,居高临下地观察法国社会的,因此他无法理解,为何民众不明白政府而非革命才是为他们好,才符合公民社会的利益。革命是反既有政体而动的剧烈政治行为,并不受公民社会利益的约束和引导。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的看法完全一致:雅各宾主义打着抽象政治道德的旗号,采用暴力恐怖主义的手法,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妄图在当代重建古罗马的历史形象。之后,当这种集体恐怖主义劲头过去时,拿破仑将其收服,纳入政治轨道,并用爱国主义权威加以巩固,对公民社会实施管制。对此,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看法有别。托克维尔认为,自此历史重又恢复了常态:由政治体制来管控公民社会,发起有效的改革、推动切实的社会进步。但马克思认为,一个本身性状不明的新晋权力阶级,其政治治理仍是无法满足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的^③。这就是为何在经历了巴黎公社之后——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场反对国家集权的社会革命,托克维尔起初预料法国会发生一场社会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④但历史的发展最终并未符合他的预想。

托克维尔悖论用社会学的语言可以阐述如下:国家既有权力机构既然治理有术,就理应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进而通过改革获得权力的合法性。^⑤但事实上,往往民众虽然欣然接受改革,却拒绝承认发起改革的权力机构具有政治合法性。以家长式思维来看,民众的这一做法不合逻辑、忘恩负义。在托克维尔那里,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和1848—49年革命时期的民众别无二致,二者实际上都从蒙昧中出发^⑥,行动缺乏明确的政治构架、

组织形式,与同处一个价值体系的其他社会阶级缺乏沟通。这样的民众所能依靠的仅仅是家庭、财产和文明,这些才是一个社会最为本质的内容。^⑤在托克维尔看来,由于缺乏沟通,这样的民众无法形成社会。为此,他颇为绝望,转而支持捍卫已有社会政治秩序的行动,甚至是采取铁腕军事镇压也在所不惜。托克维尔是保守派秩序党(Parti de l'ordre)成员,当时他积极支持卡芬雅克将军所进行的血腥镇压。但他最终还是败走拿破仑三世的现代人民专政,而将后者推送上权力宝座的,恰恰是他并未真正理解的人民大众。

五

无论是托克维尔、柯尚还是马克思,他们都在努力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历史上关于公民社会的政治语义如何^⑥。所谓政权合法性,是指政权能够在行动和语言上恰当地应对社会诉求而自动获得的一种合法性。关键在于这些应对诉求的要素必须相互协调,以便充分沟通,创造出相互联系的符号、含义、观念和认识。这样一来,就必须建立一个高度复杂且极不稳定的话语体系。最近的研究清晰而有力地证明,就在托克维尔所关注的那个年代,法国旧制度下的人们会对日常交流当中使用的话语含义表达不安、焦虑甚至恐惧。有些词汇,而且不占少数,意义发生了改变,同一个词人与人使用方法也不同。由此,法国社会在政治语言的含义与使用上所达成的默契被打破,出现“词汇滥用”现象。即使在大革命时期,词汇滥用也被看作一种政治错误,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很多讨论词汇所谓“正确”含义和使用方法的书籍和文章。控制舆论尤其要控制社会关键词汇的定义^⑦。

因此,政治语义理应正确表述公民社会,它也一直自命如此,而公民社会自然也会用基本的政治词汇来实现初步的自我表达。例如英语和法语中的 police 以及德语中的 polizey,都表示依照社会运行逻辑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但也意指政府管控下的警察群体及警察制度。这两层含义自始至终都是紧密贴合的,否则就会出现语义混乱,而语义混乱则又反映了实质上的社会失衡。试想,如果人们不再把警察看作社会秩序的代表,或者认为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岂不是社会

失衡?这个比方过于简单,历史研究的情况远比这复杂,但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托克维尔时代无法理解的东西。他由于自身的历史认识盲点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一个缺乏逻辑的矛盾,而我们今天隔了这么久再看这段历史,可以通过新的途径来理解。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中央政府并不信任社会。虽然它实行了切实的改革,但完全无视政治社会的运作,将改革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并且因为总是要维护自身特权,只是不断推出新改革却并未能将这些改革融合起来。正因为这样,法国的悖论演变成为矛盾冲突,并且最终激烈地爆发出来。

本来,社会的自我组织并非要和政府对着干,也不是要反对国家政治机构和教会组织,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参加这些社会组织的人甚至包括政府和教会精英。但问题在于,很难在国家和教会的定义范围内给这些组织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也没有合适的政治语言对其加以描述。这些组织通过其对社会的理解和阐述,不仅在实践上也在政治语义上构成了一种原始政治单元^⑧。

旧制度的法国,政治治理虽然在改革上卓有成效,但用的却是旧的政治社会那一套实践方式和语言表达,而这套体系已分崩离析。如此一来,改革与过时的指称之间的差别凸显出来,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代替,结果改革者手足无措,无法确定别的语义表达方式,也无法解释现状,甚至没法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时,人民开始向国王请愿,其中包括工匠、小店家、农民,他们控诉贵族阶级,指责现有的动产与不动产所有制、税收制度和价格制度,而这些恰恰是政治威权的表达方式。至此,人民的思维方式还是传统的,但最终他们决定推翻政权,自己做主。不过,他们之后仍然按照旧有的政治传统进行社会治理^⑨。

旧制度政权试图通过采取新举措、进行政府干预,甚至建立新制度、推行改革来适应这种现代化发展。但在托克维尔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新举措仍建立在旧机制之上,其制定仍顺应旧机制的逻辑,结果就造成这些措施逻辑和语义上的冲突,新旧之间也缺乏沟通。这样一来,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是无效和令人费解的。即使有效,也只能放到一个与旧制度时期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的逻辑和语义当中去理解。简言之,旧制度政权

的意愿其实是好的,想要满足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需求,但它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却都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相抵触。执行者曲解了政府的举措,其内部在用语和利益上也都存在分歧,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也都在用不同的说辞来捍卫自身利益,因此一切陷入一片混乱^③。

托克维尔指出了关于法国旧制度的数个悖论:中央集权却施政混乱;中央权力发起改革,执行起来却因循旧法;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他也留下了几个疑问:为何偏偏法国如此?为何大革命之后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革命?为何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如此“特立独行”?为何法国会发生革命暴力?为何法国会流行革命“病毒”?或者该这么问:为何在法国政治基础牢固、发展稳定的时期突然爆发大革命打破了这种连贯性?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充分讨论。悖论的核心显然不在于改革程度多少的问题,而在于大众所感受到、并通过政治语言予以表达的不满并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在于意识形态脱离于社会现实,无法反映和理解社会现实,“自然”退化成一种暴力^④。

托克维尔考察的对象仅限于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措施以及政治人物,但要解释他的悖论、矛盾,我们必须把社会史、文化史、经济金融史和人类学史这些被他排除在外的对象重新纳入考察范围。一言以蔽之,我们要关注“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进程”这个模糊的概念,它与中央政府机构的发展存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想通过与1789年的大革命对比来理解和阐释1848年革命。但他在研究大革命时一如研究其当代,仍然只限于在政治领域进行探索,查阅的档案资料也仅限于政治治理方面的内容。在对两场革命的探索中,他都忽视了公民社会,只因为公民社会不是政治性的社会。所以,他其实是在试图解释一件他根本不了解的事情,而且是通过用另一个他同样也不了解的事情作参照。因此,我们可以拿来对比的不在于说旧制度时期的改革与其他时期的改革,而在于他与那些因为个人对政治治理历史的偏好而刻意忽略社会历史的学者。简言之,就是那些试图用一个未知数Y来解释另一个未知数X的人。

所谓托克维尔悖论,绝非一个大众心理现象

那么简单,不是通过对旧制度的政府改革进行更好的政治宣传就能杜绝的,它其实是一个行政改革悖论:行政改革仍然沿用“古董式的政治话语”(museal words 马克思语),采用“早已废弃的政治举措”(practical political relicts 马克思语)^⑤,但在日常实践中,这些话语和举措的原有含义早已过时。

六

七月王朝为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所不齿,他们都认为当时的执政者就是一群金融投机分子,他们像寄生虫一样榨干法国。^⑥但在1848年革命的问题上,二人明显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当时,托克维尔新当选为芒什地区代表,通过广大男性选民的支持荣升贵族阶级,能得到这些活力满满而又不乏理性的选民的支持,因而感到相当自豪。但芒什地区以农业为主产业,没有工业;相应地,托克维尔的那些选民们也都是地主贵族,没有工业资本家和工人^⑦。托克维尔曾建议将地方自治的元素加入到新宪法中去,但并未成功。这恰恰体现了他对自由的理解:自由就是要制衡民主的弊端,而民主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在表达这一观点上,托克维尔毫不讳言。然而他却惧怕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并将他们描述成一群无名无姓、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这些人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群暴民,蒙昧不自知,心理不健全、受到社会主义理论只言片语的蛊惑,攻击传统财产制度和家庭制度,破坏整个文明的根基^⑧。因此,他本人自然鼓励六月镇压,对叛乱者进行审判、处决和放逐。托克维尔支持秩序党成员卡芬雅克将军,认为他比路易·波拿巴更适合当总统。由此看来,托克维尔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保守反动派,积极地捍卫着法国当时基于土地财产的所谓贵族式民主自由,这个民主是非资本主义的,其自由也仅仅是假象而已。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对法国仍未开化的工业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法国工人阶级仅能在几个像巴黎这样的中心享有政治力量。托克维尔所担忧和抗拒的,恰恰是马克思所热烈欢迎和大为赞赏的。马克思从1848年3月开始就已在公开筹备6月这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⑨,而托克维尔却正奔忙于战壕的另一端,为

参与镇压革命的士兵、农民，为贵族打气，努力论证军事镇压的必要性。1849年8月，马克思被逐出巴黎。此二人均反对七月王朝和波拿巴主义，对1848—1849年革命的评价也有一致的观点^⑳，但显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

最后，如何解释路易·波拿巴正在推行的帝国主义？或者更准确来说，鉴于1851年波拿巴政变发生，该如何看待1848—49年革命？如何看待政变之后第二帝国民主专制集团所进行的寡头统治？更进一步如何将1848年革命与1789年大革命相比，相互借鉴，获得领悟？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上又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虽然是从相同的观察出发，最后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视角，选择了迥异的政治选项。这是因为前者是贵族式民主的捍卫者，后者则是正在崛起的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而且前者对后者所支持的工人阶级充满恐惧和误解。因此，在看待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二共和的演变的时候，他们都很容易将各自的观点和参政经历杂糅其中，找到了契合点。但在路易·波拿巴的政权那里，两人都无法找到各自的认同点，甚至还不得不改变了对起初革命的理解和阐释。

不仅是马克思，托克维尔也认为，拿破仑一世虽然在政治上终结了革命的恐怖状态，并将革命原则集于自身^㉑，但他还是高估了政治统治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力，这最终导致他走上末路。接下来法国先是王朝复辟，再是自由派贵族统治，社会平等/民主迎来了一次机遇，要么像托克维尔所期待的那样，实现平和有序的政治代议制度；要么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通过政治民主实现社会革命。但路易·波拿巴的出现则逆转了一切，打破了建立在传统政治类型之上的和谐图景。他的政权是一个混乱的结合体，既包括已有的阶级，也包括一些虚幻的、乌托邦中的阶级，充斥着虚假的政治头衔和政治流派；既有自由的成分也有专制的色彩，法律上奉行折中主义，金融制度雾里看花，经济崩溃时有发生。该政权通过民主程序的支持和民粹主义的起哄，亦或通过军队警察的铁腕治理，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传统、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让整个社会陷入迷失和滑稽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托克维尔所期盼的从社会民主向贵族共和的发展根本无法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政治

社会溃烂引发社会革命也无从谈起。当时不仅是工人阶级、农民、商人和小资产者，甚至是工商业资产阶级都热烈拥护路易·波拿巴政权，整个公民社会上上下下都力挺这个几乎不可撼动的政权。尽管在传统意义上来看，这个政权荒谬、虚伪、唯利是图，它不是一个阶级去统治另一个阶级，而是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统治所有人^㉒。

因而，在托克维尔悖论背后另藏悖论：1789年大革命是公民社会对国王政权所倡导和执行的社会改革的一场反叛，其指导话语既是陈旧的（借用了“法国的自由”这一概念），甚至说是古典的（参照了罗马共和帝国），又是极其现代的，使用了几乎可以被算作是现代社会的特定话语。对于1845年的马克思而言，1789年大革命的政治话语只不过是一件“历史戏服”，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场闹剧，一个闪闪发光迷人眼的时代，遮盖了当时阶级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关系”。换言之，是托克维尔第一个描述了旧制度下的法国这样一个割裂而混乱的社会合体。这个社会，教会的政治影响失去了其社会根基，贵族阶级并不具备政治统治权力，其基于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力量也有所流失，只能努力维持其对佃农阶级的特权，并坚决捍卫自己与新获土地资产而发展起来的第三政治阶级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而新兴的第三阶级采取双重策略来反抗传统贵族阶级对其进行的打压行为，一方面通过金钱收买实现加官进爵，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社会平等，也就是托克维尔所称之的“民主”。^㉓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弗雷在重提托克维尔时所说，大型地产阶级的瓦解和中等资产者实力的增长为平等奠定了基础，而平等有利于政治民主。法国这时出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实践上的分裂，其政治体制显然不够平等，但其社会实践却早已达到了“欧洲最先进的民主社会水平”。托克维尔认为，每一个民主制度都有中央集权的倾向。政治上，公民社会会将地方自治的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夺走，通过他们的领导者——所选出来的立法代表将之拱手让给国王^㉔。中央政权反过来对公民社会进行分割和组合，创造出一群群相互对立却又相似、平等的个体。这是法国王权的一大罪过^㉕，它让社会的上层阶级失去了旧有的政治权力，也无法形成新的权力阶级，这就让官僚专制

大行其道,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中央集权^④。

通过反对新旧贵族阶级,政府权力不断壮大。起先,民主的论调被使用,是新贵族阶级成员为了争取与传统贵族平等的法律权力(isonomia),这是一种“质”的平等;进而引发政治立法和行政这个极为严峻的问题。这还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然趋势”。后来,西耶斯(Sieyès)提出“量”的平等的概念——从古老的按等级投票到按人头投票到双票制,这二者相结合爆发激烈的争论,但这种激烈的争论又会被战争或内部政治体制的大规模行动所削弱和疏导。托克维尔据此推导出了一个“自然趋势”,即民主的暴政沦为个人独裁的趋势。他得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显然脑子里想到的是拿破仑三世。

马克思则不同,他解释了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的原因,并着重分析了之后法国社会的聚合:1848年二月,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意外获得了政治胜利,普选制度得以建立;1848年六月,起义爆发,卡芬雅克将军带领军队进行了血腥镇压,随后是共和独裁统治,大批人遭到逮捕或驱逐;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之后的历史,马克思称之为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辩证的矛盾冲突,其中阶级内部矛盾以资产阶级为盛。一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之前贵族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新老地主贵族之间的冲突、新旧权贵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相互制衡。此外,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阶级间也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自我中立化。其结果是,1798年—1799年间,法国政治当中行政权力被大大加强并明显独立于立法权力,而政治力量相对于公民社会也大大增强。

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基本认定这一点:市民社会最终会在政权统治形式当中找到方法自我表达,而政权也会对公民社会的结构和利益诉求作出合理的回应,这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尤为如此。如果某个政治阶级出于某些历史原因一直担任社会的权力代表,进而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整个国家,那么它终将遭遇失败,轻则受人诟病,重则陷入灾难性的混乱。法国所经历的这个由混乱的政治语义、革命和飘忽不

定地的强权统治所构成的复杂历史现象就是托克维尔悖论的历史真意,但这一悖论并不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更不是理性的规律。^⑤

(本文由熊颖哲翻译)

-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1836, book III, ch. IV.
- ② Francois Guizot, *Cours d'Histoire modern*, Paris, 1828.
- ③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2 vols, Paris, 1835, 1840.
- ④ Souvenirs, Paris, 1893.
- ⑤ 巴黎迦利玛(Galimard)出版社1952—1953年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收录了托克维尔写作此书过程中的笔记、手稿和相关材料。
- ⑥ 托克维尔经常论及各阶级中过于亢奋的情绪状态、风俗和思想状况。
- ⑦ 在托克维尔第二卷有关部分的手稿中,有一封信涉及到了他的研究计划。
- ⑧ 1787—1788年间在凡尔赛宫召开的无果而终的显贵会议(convocation of the notables)就是例证。
- ⑨ L'Ancien régime, III 4.
- ⑩ Augustin Cochin, *Les sociétés de pensée et la démocratie*, Paris, 192. 柯尚本人对此有异议,认为这个抽象的社会概念造成了人性的丧失。见 Fred E. Schrader, *Augustin Cochin et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1992.
- ⑪ Daniel Roche, "Personnel culturel et représentation politique de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aux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Révolution", in: Hinrichs et al., *Vom Ancien Régime zu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Göttingen, 1978.
- ⑫ Robert Darnton, *La fin des Lumières*, Paris, 1984.
- ⑬ Gustave Le Bon,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s*, Paris, 1913; later Sigmund Freud,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 - Analyse*, 1921; but already Emile Durkheim,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Paris, 1894; Qu'est-ce qu'un fait social.
- ⑭ 这个关键问题在几乎所有有关柯尚的著作中都没有涉及,显然是这些作者疏忽了。
- ⑮ 这同苏联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政治审判的逻辑如出一辙。参见: Fred E. Schrader, *Der Moskauer Prozeß 1936*, Frankfurt/M. 1991.
- ⑯ Augustin Barruel,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Hamburg, 1798—9.
- ⑰ 孚雷则将托克维尔和柯尚的不同解释看做是一种冲突,而不是相互补充,见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8, reprint in: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2007, p. 187, p. 188, p. 191.

- ⑮ *Democracy*, II, 2/7.
- ⑯ *Souvenirs*, II/2, i—ii 具体是在论及新形成的大众阶级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
- ⑰ Cf. G. W. F. Hegel, *Rechtsphilosophie*, § 303.
- ⑱ Die Heilige Familie; cf. Hans — Peter Jaeck, *Die französisch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von 1789 im Frühwerk von Karl Marx (1843 — 1846)*, Berlin, 1979, pp. 121 — 124.
- ⑳ Wolfgang Wippermann, *Die Bonapartismus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 Stuttgart, 1983, pp. 61—78.
- ㉑ Niklas Luhmann,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Frankfurt/M. 2001, p. 27 sqq.
- ㉒ *Souvenirs*, II/2 ii—iv.
- ㉓ ZIT mit bildern.
- ㉔ Marx in the political semantic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dialectics of the 18 Brumaire, cf. below.
- ㉕ Reichardt etc Koselleck.
- ㉖ /if like Illuminates of weishaupt, it is revolution INSIDE bureaucracy/ and, they do not glorify this society, they criticize this society as ill, and are looking for moral remedy and treatment as well. mesmerism.
- ㉗ “道德经济学”是 E. P. Thompson 提出的术语, 见其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this also applies to the maxima for bread during the Revolution, as well as to the “abstract” regulations observed by Cochin in his *Les Actes du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Paris, 1920, 1935.
- ㉘ On veut tout lire; & cette confusion de lectures ne peut que détruire une idée par une autre; ... une source d’erreurs; à chacun sa manière de penser; Carraccioli, L. A., *Les prérogatives du Tiers—état*, 1789, p. 33, p. 26.
- ㉙ ANM(semantic history; revolution — discourse — exhausting ...) and; this theoretical / political default is a default of

EVERY of the acting parties in the situation; this also explains the totally self contradictory positions of popular men like languet, who himself is very clear; or the impossibility for sieyes to have the default of “being too logical”.

- ㉚ Marx means the costume of the permanent reference to Roman History and the classics of political theor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 ㉛ Cf. the characteristics given by Tocqueville in his *Souvenirs*, and by Marx in his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 ㉜ *Souvenirs* II/2 iv.
- ㉝ what is at stake here is not a political form but property, family, civilization, that is, everything that attaches us to life”.
- ㉞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26 June 1848.
- ㉟ Tocqueville, in his turn, talks about about June 1848 as the most dreadful of all civil wars, the war of class against class, of those who have nothing against those who have.
- ㊱ La Révolution est close; ses principes sont fixés dans ma personne. Le gouvernement actuel est 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souverain, il ne peut y avoir de révolution contre le souverain.
- ㊲ This is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the 18th Brumaire.
- ㊳ II 8—9.
- ㊴ Important observation of Furet, p. 150.
- ㊵ III 10.
- ㊶ Furet, p. 165.

作者简介:史傅德,巴黎第八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shrader@fudan.edu.cn。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姜守明〕